

目 录

南乐县建置沿革.....	(1)
南乐县名由来.....	(3)
四支队的创建与发展.....	(6)
刘大风在佛善村.....	(12)
安明同志生平.....	(18)
回忆刘中山伯伯几件事.....	(20)
团结全党 依靠群众 坚持武装斗争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22)
铜墙铁壁“武联防”.....	(27)
军民联合拔炮楼.....	(31)
附嘉奖信	
东韦村惨案.....	(33)
风雨同舟斗敌寇.....	(34)
刘县长不幸陷虎口 秦树宝智勇救亲人.....	(35)
军民情逾亲骨肉 妇女掩护子弟兵.....	(37)
巾帼英雄 火线支前.....	(39)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乐县参议会.....	(41)
赵保珍反正.....	(44)
南乐解放.....	(46)
打垮红枪会 保卫新政权.....	(48)
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纪念烈士王高峰.....	(51)
乔派坠子的奠基人——乔清秀.....	(53)

南乐百花园中的芳枝——戏曲·····	(59)
南乐草帽辫源流小考·····	(64)
中国国民党南乐县党部建立及其初期活动·····	(68)
打碎锁链 还我天足·····	(72)
《天足会知单》小引·····	(75)
军阀混战中的南乐之战·····	(76)
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	(77)
南乐县衙简介·····	(8)
萧曹庙·····	(84)
南乐城内究竟有多少座牌坊·····	(85)
怒捣佛善村教堂·····	(87)
在“慈善”面纱的后面——洋教士在南乐二、三事··	(89)
官场轶闻·····	(91)
南乐回族及其习俗·····	(93)
鬼窟·群魔·····	(96)
略谈杨法贤的发迹与劣迹·····	(99)

南乐县建置沿革

南乐县历史悠久，远在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繁衍生息。

原始社会末期，颛顼建都帝丘(今濮阳境内)，县境为畿辅地。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地跨冀兖二州。夏，南乐地属夏方国之观国管辖。

商代早中期，县境为商王朝附庸国之颍国管辖。商末为殷都畿辅地。

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康叔建立卫国，县境在卫国境内。

春秋，县境仍属卫国。后来成王弟叔虞建立晋国，县境又为晋国属地。

战国，县境属魏国地。赵将廉颇伐魏取繁阳后，县境又为赵国国土。

秦统一中国后，设东郡于今濮阳一带，县境在东郡境内。

西汉初年始有县的建制，县名乐昌。县城位于今梁村乡吴村北仓颉陵古文化遗址北侧，属东郡；新莽时期，改东郡为治亭，属治亭；东汉建武年间撤销昌乐县，县境分属东郡的东武阳县和魏郡的阴安、元城、繁阳三县。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县境为魏国地，分属冀州的魏郡和阳平郡。

晋，恢复县的建制，更名昌乐，县城与汉置乐昌县同垣，先属司州顿丘郡，后改属魏郡。

南北朝，前燕置昌乐郡，领昌乐县；北魏初（公元386年）郡县均被撤销，县境并入魏县。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分魏县置昌乐，属魏郡。永安元年（公元528年）置昌乐郡，兼领昌乐县；东魏天平中（公元535年），撤昌乐郡，昌乐县改属魏郡；北周又置昌乐郡，兼领昌乐县。

隋，开皇初，（公元581年），撤销昌乐郡，昌乐县改属魏郡。大业初（公元605年）省昌乐入繁水，属武阳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623年）分魏县置昌乐，属魏州。次年，县城由吴村北迁谷村一带。后梁改昌乐为南乐。

宋，初属河北东路大名府。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改属澶渊郡开德府，后仍属大名府。县城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九月后由谷村东迁今址。

金，属大名府路大名府。

元，属中书省大名路。

明，初属中书省大名府，后改属北平布政司大名府。

清，初属盛京大名府，后改属直隶大名府。

中华民国，初沿清制，仍属直隶大名府。二年（1913）改属直隶大名道。十七年（1928）改属河北省大名道。二十五年（1936）改属河北省大名行政督察专员区。三十年（1941）改属冀鲁豫边区濮阳专区。同年，县之西境划入卫河县。三十五年（1946）卫河县撤销，原划出部分归还南乐。三十八年（1949）改属平原省濮阳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属濮阳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后，划入河南省，属河南省濮阳专区。1954年安（阳）濮（阳）两专区合并，改属河南省安阳专区。1958年新（乡）安（阳）二专区合并，改属河南省新乡专区。1960年新安二专区分治，复属河南省安阳专区。1983年9月安阳地区撤销后，南乐隶属濮阳市。

（谷 相 乾）

南 乐 县 名 由 来

南乐县制之始，肇自西汉初年，大多认为在高祖年间，具体时间不详。县初名乐昌，以境内有昌意城得名。乐昌县筑城于昌意城侧，在今县西北三十五里处。昌意，人名，相传为黄帝之子，颡顼帝之父。按《竹书纪年》，黄帝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名昌仆。考若水，在四川，娶妻蜀山氏，又可为佐证。清代有学者考证，南乐为昌意封地，其城系“未降居时所筑”。颡顼称帝于帝邱（今濮阳境内），濮阳市辖区为其属国，袭其父封地，亦在情理之中。昌意其人，远在两周时期已被人们奉为圣人，秦汉尤然。南乐境内有昌意城，《魏书·地形志》就有记载。汉人以此地为古圣贤昌意封地，沃野平壤，茫茫乐土，县城依附昌意古城，取吉祥美好之意，故称“乐昌”。晋置昌乐县后省。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复置，其二字前后颠倒，出于何因尚不可知。

拓跋氏改昌乐县，至五代后梁又四百余载，其间几省几置，兴衰易替，县城因黄河涤荡而迁徙，境域以兵事频仍而变化。唐代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为避黄河水患将县城南迁，仍名昌乐。二百八十年后，朱李石刘柴争霸中原，兵无宁日，烽火连绵。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昌乐县城为晋王李存勖占领，旋即夺取中原大片土地。李存勖原非

汉族,其祖先为西突厥人,居陇西,姓乌邪氏(一称朱耶氏),其祖父乌邪赤心归顺大唐为将,颇有军功,受唐王赐姓,改李国昌,封为晋王。李存勖袭祖、父职为晋主,避讳“昌”字,遂于公元916年,取“新城在旧城之南”意,改昌乐为南乐。尔后虽然县治有迁徙移动,但南乐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南乐县城东迁至今址。现在的南乐城已九百余岁。在南乐历史上,乐昌一名用了二百五十余年,昌乐用四百余载,而“南乐”,一名,至今已有一千零七十一岁的高龄了。

(史国强)

四支队的创建与发展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仓惶溃退，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中华民族到了危亡关头。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坚持华北抗战，保卫家乡，不当亡国奴。

九月，我县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刘大风同志被委任为直南临时特委负责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恢复各县的党组织，二是发动民众建立人民武装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联络了坚持地下斗争的王从吾、刘汉生、张增敬、刘晏春、王振华、晁哲甫等同志，响亮提出：“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

十月，直南特委在清丰南乐交界处的青石礅召开会议，决定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以“抗日救国十人团”为骨干，争取同情和支持抗日的地主武装，发动广大青壮年，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正值日军攻陷大名，国民党一八一师石友三部退驻南乐城西西审什村。为便于游击队建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特委同我党在一八一师作统战工作的骑兵队长张克威、教官袁也烈取得联系，征得石友三的同意，只给了个“一八一师游击队”的番号。但不给枪支、弹药等供给。

十月下旬，在留固店村“一八一师游击队”正式成立，张克威兼任队长，刘大风任副队长，袁也烈任参谋长。不长时间游击队发展到六十余人，五十余支枪。十几天后，部队在清

丰县古城驻防。这时一八一师南撤，河北省民军司令高树勋在我党“坚决不当亡国奴”的号召感召下，率部进驻清丰。游击队经与高树勋的副参谋长唐哲民联系（中共党员），商定将一八一师游击队改为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唐哲民任支队长，刘大风任副支队长，张静岑（后张西三）任参谋长。高树勋还亲自到古城检阅部队，发给三十支枪，三千发子弹，一万块钱法币的军费。这时四支队已发展到二百余人，一百多条枪，建制三个中队，一个通讯排。十二月十五日，日军攻陷南乐，炮击清丰，高部南撤，唐也随同南下。四支队由刘大风负责。这一时期，四支队打击汉奸，生擒日寇，威震直南。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支队行军到井店集（由我党平杰三领导的以濮阳专区保安司令部名义组建的第八大队驻地），根据特委指示，将八大队主力同四支队合并，仍称四支队，两支部队合并后，共有四百余人，二百七十余支枪。建制四个中队，一个通讯排，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当时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号称冀鲁豫边区八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丁的部队是由濮阳的民团改编而成，号称一个旅，战斗力很差。由于日军两次入侵，丁已成惊弓之鸟。他的一部已南渡黄河，又将司令部设在黄河沿岸的常庄，为自己南逃作准备。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四支队驻到小濮洲。特委书记带领阎志清同志去丁树本司令部谈判，并达成了三项协议：1、四支队受共产党领导，单独打游击；2、丁树本不向四支队派干部；3、四支队可以改用丁的番号，改编为丁的“冀鲁豫八县保安司令部民军四支队”。他们从丁部领回关

防、符号和五千元经费，从此四支队便成为丁树本管辖之下的四支队了。

九日早晨，部队接到通知，全体集合村西头广场，听丁树本、陈明绍讲话，这一天正值小澳洲大会，赶会的人很多，部队集合后，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把部队围的严严的。丁树本开始讲话，哨兵匆忙赶来，报告西边发现骑兵，丁树本听了一愣，定定神又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要怕，那是我们的骑兵”。可是，不一会，哨兵又急忙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穿的黄军装，骑的是洋马，日本人来了”。这下子，丁树本、陈明绍慌了手脚，骑上马跑了。

四支队副支队长肖汉卿同志，沉着机智，经验丰富，在此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命令二中队正面攻击，三中队从右翼、通讯排从左翼包抄敌人，整个四支队迅速行动。那一天，因为赶集的人多，把部队围得很紧，敌人虽然离部队很近了，但他没有弄清情况，并未发现四支队。而且日寇这次出来的目的是搜索丁树本的住处。三十多个骑兵是尖兵，因为他们从大名南侵没有遇到过抵抗，骄横惯了，毫不介意，加上他们的目标是常庄，所以没有战斗的准备。当敌人进入射程以内时，副支队长一声令下，二中队轻机枪手马纪德同志一梭子弹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七个鬼子跳下马来就地抵抗，战士吴振卿冲上去，刺死了一个鬼子，夺了一支三八式马盖板枪；另一战士外号叫老毛司的同志冲上去刺死了一个鬼子，又夺了一支三八式马盖板枪，战斗打响不多时间，就缴获了四支枪和一匹马及其他军用物资。敌人且战且退。

左翼通讯排与继续顽抗的敌人战斗在一个坟头堡，右边

是一班长齐槌，左边是二中队战士靳生云，当一颗子弹射中靳生云的左肩时，齐槌掩护靳生云撤下，并带领通讯排的一班，为消灭敌人冲到最前面。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后，一班的同志还把一个牺牲的同志抬了回来，这一行动，受到支队部的表扬。这次战斗，四支队打死了四个鬼子，缴获四支日本三八式马盖板枪，战马一匹，还有子弹、药品和部分军用品。当时，战士问支队长，为什么还没有把逃跑的三十个鬼子消灭，就命令撤退呢？他说，这是敌人的尖兵，我们打响后，敌人大队摸不清情况不敢贸然前进，等他们的人逃回后，定会迅速反扑，如果我们撤的慢了，会吃亏的。话刚说完，果然大队敌人反扑来了，为了保护丁树本，支队长命令部队往东北方向撤退，敌人尾追。天黑后，四支队住下了，敌人也在离部队很近的村庄住下，而四支队悄悄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安全地迁回到常庄。

凶狠的日军吃了亏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四支队的下落，追了一天一夜，三月十一日拂晓，到常庄附近。丁树本命令，保卫常庄，打阵地战。支队领导分析了敌我力量：“当时日军只有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骑兵小队，还没有组织伪军，力量是很小的，我军有四个中队，丁树本部有几个连，保安团也能配合。我们虽然吃不掉日军，但常庄是丁树本的司令部所在地，为了帮助丁树本，也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支队部决定服从丁树本的命令，打一个阵地战。”丁树本要部队老红军二中队长陈耀元同志指挥打正面，把他的部队都摆到两侧。为了团结抗战，拂晓前，四支队的部队就进入了常庄外围的正面前沿阵地，陈耀元同志勇敢机智，指挥有方。战斗当天就打响了，四支队的战士顽强战斗，涌现出许

多阻击手。二中队二排长张清聚沉着阻击敌人，敌人发起几次进攻，一直未突破四支队的阵地。中队和排级干部在陈耀元同志的指挥下，在政治教导员季铁中同志的战场鼓动下，最后终于打退了敌人，给丁树本部队树立了一个榜样。

群众看到部队的战士英勇果敢，把水和饭送到火线上。群众抗日保家的热情，勇敢机智的支援，更加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意志。

丁树本的部队在两侧的战斗中，还顶不住敌人的火力，不断向参谋长陈明绍告急，陈明绍看到这种情况，相形之下甚有愧色，急得他大骂大嚷说：“四支队打正面都能顶得住，你们为什么顶不住？”

因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是孤军深入，又不了解四支队的底细，怕拖下去吃大亏，三月十二日拂晓就撤退了。据群众说，敌人撤退时，拉了几车用麻袋装的尸体，狼狈退回濮阳。

这次战斗，鼓舞了群众，教育了友军。刘晏春在小濮洲一带领导的游击队也合并到四支队。这时四支队已发展到六七百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四支队由副支队长肖汉卿指挥，解放了清丰县城，逮捕了二十四名汉奸，处决了八名，大快人心。参谋长张西三和秘书主任李渭川同志带领一个中队，攻克南乐县城，伪县长何举之落荒逃跑，其弟何贤轩等七名汉奸被逮捕处决。四支队乘胜前进，又收复了距大名十公里的交通重镇——龙王庙。

五月间，井店镇附近的地方领导人刘相友，在我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毅然率领数百人和数百条枪，加入了四支

队。四支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七百多支枪。

一九三八年，丁树本背信弃义，把原商定的大名县长改派为陈明绍，并积极策划改编四支队。在此情况下，按照上级指示，四支队北上广平、肥乡一带，与八路军会合，先后改编为东进纵队七支队、东纵三团、一团、一二九师七旅十九团，九年中转战在晋冀鲁豫边区各地，屡建战功，一九四一年秋，由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授予十九团为一二九师模范团光荣称号，载入人民军队的光荣史册。

（李进法、常文亮整理）

刘大风在佛善村

刘大风同志，南乐县佛善村人。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根据党要向农村发展的指示，于一九二六年底，就在本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领导贫苦群众，同地主豪绅开展了英勇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震动了全县。他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南乐人民中广为流传。

佛善村位于南乐县西部，是全县有名的第二个大村庄。当时全村有八百余户，三千多口人，九千多亩土地。该村自然条件很差，土地瘠薄，十年九旱，先旱后淹；水、旱、蝗风灾害时常发生。况且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仅九户地富就占去四千多亩土地。将近全部土地的一半。而广大贫苦群众则土地很少，有的甚至地无一垅，不得不靠当长工、要饭维持生活。一九二七年前后，由于军阀混战，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之豪绅地主的残酷剥削，佛善村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政治上，豪绅地主勾结官府，任意欺压群众，无恶不作。贫农潘同，一年青黄不接时，因勒了地主的榆叶，被地主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其妹妹又被地主一脚踢死，旧社会地主有钱又有势，穷人有冤无处伸，佛善村劳苦群众有的被迫逃山西，有的无奈闯关东，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此，他们迫切要求革命，改变吃人的旧世道，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

刘大风同志，从小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又在革命思潮的

影响下，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一九二六年秋在大名七师求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他就回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了农民刘峰为党员，不久，潘斌、刘介法、吴书升、吴思温也先后参加了党组织。一九二七年十月，刘大风从武汉农讲所学习回来，除了参加县委的领导工作之外，还亲自领导本村的农民斗争。为了开展工作，他和刘峰打入“红枪会”，利用合法身份，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文章。刘大风同志走家串户，深入牛棚草舍，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他联系本村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群众的事实，指出：穷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收了粮食交地主，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而地主豪绅一年到头不劳动，反而吃得好，穿得好，这不是穷人命穷，而是豪绅地主剥削压迫的结果。经过他耐心教育，广泛深入地发动，佛善村群众逐渐懂得：“不把豪绅地主推倒，广大穷苦大众根本活不下去，只有学习湖南和海陆丰的农民，才有生路，才有奔头”。在党的领导下，觉悟起来的穷苦群众，组成“穷人会”，同地主豪绅展开了斗争。

根据党的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底，“穷人会”针对朱文灿为首的豪绅地主出卖本村庙会地一事，开展了算公帐斗争。那时这一带农村中大都有庙会地，这是公地。因此，土地的收入应该用到按人口摊派的项目上，而这年朱文灿等地主，卖了四亩庙会地，顶替了应按地亩摊派的上交旧政府的钱粮，这实际上是地主将负担转嫁到穷人身上的一种办法。村党支部刘峰、吴书升等同志，在刘大风的具体帮助指导下，带领“穷人会”和其他

群众三百多人，在大街上与地主豪绅公开讲理，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庙会地窃为己有，随便买卖，揭露他们欺压、剥削穷人的卑鄙手段，说得他们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朱文灿等不得不在公众面前低了头、认了错。后又卖地五亩，把粮食分给了群众，使一百多户穷人过了个春节，并买了一部分小镢头，每户穷人都分了一把，这次斗争，打击了豪绅地主势力。地富偷偷地说：“现在穷党起来了”。大地主向穷人低头认错的消息传开，震动很大，外村群众纷纷议论说：“佛善村的穷人干得好，只有同豪绅地主开展斗争，穷人才 能 生 存”。

经过算公帐斗争，党在农村中的威信提高了，党组织又发展了二十余名党员，壮大了力量。这个斗争，也使群众真正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不少人纷纷要求参加“穷人会”。“穷人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一九二八年麦收时，“穷人会”又领导了铲麦茬斗争。旧社会，烧柴困难，麦后群众全靠烧麦茬做饭。无地少地的穷人都需要铲地主的一点麦茬，但地主豪绅宁可耕地时翻在地下，也不让穷人铲，穷人铲地主的麦茬，被发现后，非打即罚。刘大风同志为发动群众，使铲麦茬斗争能够开展起来，他首先让“穷人会”把自己家的麦茬铲了。而后，“穷人会”就铲地富的麦茬，地富禁止，群众就给他们辩理说：“庄稼是我们穷人种、穷人管、穷人收，收了粮食入了你们的仓，难道我们铲点麦茬就不行？”由于这次铲麦茬斗争，首先铲了刘大风家的麦茬，又加上“穷人会”人多势猛，哪个地富也不敢强出头阻拦，只是背地里说：“现在穷党人多心齐，真厉害”。这年秋，豪绅地主鉴于“穷人会”夏季铲了他们的麦茬，怕秋

季再和他们斗争，就串连一气，防止再动自己的一草一木。有一个曾在军阀部队当过连长的人，自恃自己有势力，发话说：“谁敢打我的高粱叶，动我一个柴火把也不行！”“穷人会”认识到，这是豪绅地主的反扑，对群众的政治威吓，决定开展打高粱叶斗争。于是“穷人会”组织了二、三十个人，先打他的高粱叶。他很远就大喊：“谁叫你们打我的高粱叶哩？住手，都给我放下”。“穷人会”的人继续打，不理他。他走到跟前一看，感到气氛不对，马上态度软了下来，立刻笑脸相迎，说：“哦，原来都是咱村爷们，我觉得是外村的人呢？好，你们打吧，我给爷们弄两个西瓜去”，他慑于群众的威力，真的抱了两个西瓜来。

以朱文灿为首的豪绅地主，看到“穷人会”力量的一天天壮大，非常恐惧，为了维护其地主阶级利益，他们密谋利用会道门——“蟠桃会”与“穷人会”争夺群众。宣扬什么：“加入‘蟠桃会’，全家保平安”，从而迷惑群众，拉拢不少穷人参加这个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刘大风、刘峰同志，打入该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蟠桃会”的迷信、虚伪。该道其中有一条规定，道首讲的，不准外传，谁传出去，就要遭到五雷轰身的大祸。刘大风就利用这一条，把道首的迷信说教，公开在群众中讲，他说：“我把道首讲的传出去了，怎么不五雷轰身呢？”同时，他还进一步揭露“蟠桃会”的反动本质，指出：“穷人只有组织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才能过好日子”。群众觉悟了纷纷退出“蟠桃会”，参加“穷人会”。“穷人会”会员迅速扩大到三百多人。

“蟠桃会”垮台以后，豪绅地主不甘心失败，依仗官府